

圣迹与霞光

——妈祖学术论坛集萃与新探

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 编

(中)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圣迹与霞光

——妈祖学术论坛集萃与新探

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 编

(中)



妈祖与天津文化

天津,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有人说,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这种说法道出了二者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天后宫之前,虽有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镇,但它们都是军事建置,要说天津市文化的原点,应该在天后宫。

以天后宫为标志的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文化,它是民俗性与经典性文化的融合;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文化,它是地域性与世界性文化的沟合;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它是文化性与经济性文化的汇合;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文化,它是历史性与现实性文化的结合。

一、天后宫,天津社会文化的原点

金元时期,天津的土著居民主要在三处:一是三岔河口,金太宗六年(1234年),高松、谢实等18人奉旨在这里造盐;二是大直沽的造盐酿酒之家;三是侯家后有沿河而居者。这些是天津地区最早形成的聚落。但是,当时土著居民很少,用《天津卫志》的话说,是“凋零殆尽”。妈祖文化传入后,与直沽地方文化结合,形成了既有共同特征又有盐酒、漕运等地方文化特点的天津妈祖文化。比如三月二十三日娘娘寿诞之前,娘家要接一次姑奶奶到西头如意庵,就是天津姑娘回门的民俗。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它是离乡背井的人民思富的向往所在;它是从事漕运人们的最佳选择,所谓的“舟车攸会,聚落始繁”;它是经商的人们看重的理想交易场所;它甚至是有苦有难的人们免灾求福的精神寄托。从而形成了“五方杂处,五行八作,率多流寓,商贾凑

集”的天津移民城市的特点,带来了天津人口第一次爆发性发展。《天津卫志》载了户口 309 人,除 14 人籍贯不详外,在 295 人中,来自 17 个省,16 个州县。

妈祖文化具有很强的作为力,天津卫城筑建于其旁,它是重要原因之一。妈祖文化具有很强的继发力,在天津建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天后宫一带都是天津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心。直到清朝中叶,在天津全部居民的 20 万人中,城里也只占 10 万多,而东门外与北门外沿河地区仍然占到八九万人。妈祖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天津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比如语言、习俗、文化教育、道德风范,甚至包括建置等等,都因它的力量所及或定型、或发展。

二、天后宫,天津商业文化的原点

妈祖活动,既是文化活动,又是商贸旅游活动。人群的聚集,就会有商品的交换,就会有贸易往来,就会形成集市。南方的“场”,维吾尔族的“巴扎”,也是聚而成集的。随着天后宫妈祖活动的开展,宫南、宫北街市逐渐繁华起来。宫南、宫北大街,像展开的双翼,一边面对海河,一边面对卫城,不仅直接为与漕运有关的商业活动服务,成为北方地区盐业和粮食业的集散地;而且繁荣的街面吸引了各地各业各种商品经营。诸如土特产品、名食小吃、生活用品,还有南北大货中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烟酒茶糖、丝绸绫缎等。

在宫南、宫北大街的延长线上,经北大关,一直到西北角、估衣街等,更是店铺林立,形成了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区和商业街。如肉市、鱼市、牲口市,茶市、布市、洋货市等等。很多古老字号,如谦祥益、瑞蚨祥、元隆号、同升和、正兴德、耳朵眼等等,也都落脚于此。

天后宫的商贸火爆,从妈祖的寿诞活动期间,进而发展到平常的日子和其他节日。特别是春节,宫南、宫北大街上的年市景象,反映了老天津卫最辉煌时期的繁华。正如 1931 年 2 月 8 日《益世报》所载:“天津市面,最能表现旧历新年之征象者,盖无过于宫南宫北街。”虽然当时政府因统一国历,三令五申,地方晓谕劝导,终不能扭转此相沿之风尚。

五光十色的新奇年货，应有尽有，年画、春联、彩灯、窗花，压颤了街心：为了应“例儿”，家家户户还要到这里来买碗，以示“有饭碗”之意。形成了天津年市之大观。直到今天，重修的宫南、宫北大街，仍然命名为文化街；津门故里当年商业繁荣的遗风，依然存在。

三、天后宫，天津多元文化的原点

妈祖文化是俗文化，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妈祖文化在发展、在扩展，天津的妈祖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扩充了多种文化，特别是经典文化。所谓经典文化，是指传统的有价值的国文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女被皇封。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皇帝封林默为“顺济夫人”。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被晋封为“天妃”，后经历代多次晋封，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再被封为天后。这样，林默不仅由人变成了神，而且由民间的一个偶像，变成了亦官亦民之神。妈祖文化除了民俗性之外，不能不带上传统的特性。

第二，娘娘会被封为皇会。为庆祝娘娘诞辰而举办的娘娘祭祀活动，本来是民间花会。清乾隆年间，乾隆下江南经过三义河口，看到娘娘会大加盛赞，御赐四名鼓手黄马褂每人一件，四位演唱鹤童金项圈各一个，并有龙旗两面。从此娘娘会晋升为皇会。每到会期，送驾、接驾、巡香散福，礼仪至高，规模宏大，活动日多，人员广众，久盛不衰。据1930年《益世报》报道：“因为前清旨开皇会的黄报，曾经在上海张贴，所以南方也有人专程赶这次三月的庙会。而且不但中国人信她，日本人信的尤其厉害。”这样的皇会文化，绝不是用民俗文化所能包含得了的。

第三，妈祖文化注入了文人文化。天津的天后宫就引进了高雅的文人文化。寓居水西庄的江南才子，诸如主笔《天津府志》、《天津县志》的汪沆等人，或对天后宫作过专门的研究，或为天后宫撰写过诗词、楹联。据新编《南开区志》记载，著名文人汪沆、华鼎元、崔旭、张翥等人，为天后宫做诗、楹联或专文30多首、篇。他们从妈祖文化获取了营养，又把水西庄乃至江南文人文化带给了天后宫。文人文化的注入，提高了妈祖文化的品位。

第四,由海神发展为多功能神灵。妈祖本是海神,但是随着妈祖信仰的升温,天津的妈祖便由单司航海之职发展成护城之神,祛灾赐福之神。事实上,在天津天后宫内,也是诸神并存的,关帝、药王、眼光娘娘等,不下百位。这种多功能神灵的扩展,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念要求,也可以看成是天后文化内涵的延伸。在这种多元性的妈祖文化中,就不乏儒家、道家文化。而儒道文化,正是中国经典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既是多元性的,又是长时期沉淀和积累形成的。政治上,可以讲爆发,一夜之间便能推翻一个政权;经济上,也可以讲爆发,几天之间便可成为“暴发户”。而文化上,不能讲爆发。想在很短的时间,用几个样板戏实现文化革命,结果反而倒毁坏了文化。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京派文化,带有“官的帮闲”;海派文化,带有“商的帮忙”;而我们的津派文化,则是带有“民的帮助”。光是民俗文化,建成不了国际大都市;光是高雅文化,也不会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只有两者的结合,才会衍生出有血有肉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德国一位哲学家曾经说道:一个新文化的发展,常常要回到它的原点,去寻找力量和源泉,然后再前进,再发出耀眼的光辉。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和我国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建设新世纪的妈祖新文化,并进而使天津文化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这就是我们研究天后宫,发扬妈祖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郭凤岐(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天后宫——天津文化的原点》,选自《妈祖文化论文集》(第一册),第52~53页。

妈祖崇拜传入天津后经历了多种变异。明代天津的地位发生了两个较大的变化。一是筑城建卫后,由军事据点向城市发展。二是海上漕运逐渐被运河漕运所代替。由于第一种变化,天津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到清

代开埠前城市人口达到近 20 万人。城市的发展使漕运之外的城市经济活动日益丰富,从而使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增加。由于第二种变化,天津出现了与妈祖竞争的河神金龙四大王,每年漕帮来津时必随船携带金龙四大王的牌位到津,供奉在河北大王庙内。上述两种变化都是淡化妈祖崇拜的因素。但是明清两代妈祖崇拜在天津都有增无减,天后宫的香火在天津的上百座庙宇中独占鳌头。特别是每年三月二十三妈祖圣诞前后的赛神会在清代发展成一百一十道花会表演的“皇会”了,“皇会”无论是规模还是表演水平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既然妈祖崇拜的重要性在降低,为什么妈祖崇拜却更兴旺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先入为主,妈祖从元代起就在天津扎下了根,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四金龙大王始终无法撼动妈祖的地位;二是明清两代天津的妈祖崇拜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天津人已经把妈祖崇拜改造成了一种城市文化。

在天津的妈祖崇拜活动中,海事的内容退居其次,如在福建沿海流行的造船过程中的仪式,鱼汛期渔船出海的仪式等特色在天津天后宫就很少见了,而围绕天后诞辰的庙会活动却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天津人最盛大的节日和最盛大的表演游行活动。“皇会”的会档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服务性的,如扫殿会、净街会、请驾会、护会、梅汤会等;一类是仪仗性的会,如门幡会、太狮会、广照会、宝鼎会、接香会、日罩会、灯罩会、銮驾会、华辇会、护驾会、灯亭会、鲜花会等;一类是表演性的会,如法鼓会、大乐会、鹤龄会、重阁会、捷兽会、中幡会、跨鼓会、高跷会、五虎扛箱会、拾不闲会、庆寿八仙会等。其中第一、二类会与天后的迎送仪式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天津“皇会”的特色,而第三类会则与各地农村中的花会表演大同小异。其表演的内容与形式很难说与妈祖有什么直接关系,其中既有佛教、道教的内容,也有民间传说、戏曲小说人物等,可以说是华北地区农村民间文化的荟萃,远远超出妈祖崇拜的内容。各档花会的组织有的来自社区,有的来自行业,也有附近郊县的。但是这上百档花会却有一套自发的协调规范,组织严密,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妈祖崇拜的号召下进行的。精美豪华的仪仗、精湛的表演、富丽堂

皇的宏大场面，使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之中。皇会满足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也弘扬了天津市民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体现。

其次，庙会使天后宫成为天津重要的商贸活动中心，这是天津人从妈祖崇拜中发挥出的另外一个功能。天后宫的庙会每年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春节前后。每年腊月下半月起，宫南宫北大街就成了天津人的年货市场。货物多为祀神用品、工艺品、玩具、日用品等，庙会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一直要热闹到正月十五，延续一个月左右。另一次就是“皇会”期间的庙会，一般延续半个月左右。由于“皇会”期间政府免收厘税，届时“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由御河起，到北河海河，帆樯林立。如芥园，湾子、茶店口、院门口、三岔河口、如有可以泊船之处，几乎无隙可寻。河面黄旗飞舞空中……数日之内，庙旁各铺面所买货物，亦利市三倍云。”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有限的商业需求不足以支持大量的城市发展，传统的城市往往首先是政治中心，所以集市和庙会就成为城市商业经济的补充。如北京就有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等十几个庙会。天津的天后宫庙会则为繁荣天津市场起了不小的作用。

天津人认同了天津，但妈祖只靠海上护航的功能却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城市生活的需要，于是人们就把妈祖的功能加以扩充。皇会出巡时共有五位娘娘，除天后外，还有眼光娘娘、痲疹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主管生育和小儿健康的女性神祇在各地民间流传很多，如送子观音（也成子孙娘娘、催生娘娘、投儿娘娘、奶母娘娘等）、碧霞元君、紫云英夫人等。天后宫所谓拴娃娃的习俗在华北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缺医少药、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中，人们太需要这类女性保护神了。既然妈祖是女性，把这些功能嫁接到她身上并不奇怪。实际上天津人把天后宫叫做“娘娘宫”，并不刻意分辨到底是五位一体的娘娘呢，还是群体的娘娘。当然人们还在天后宫摆上了千手千眼观音、关帝、财神、唐明皇、吕祖、张仙等神祇，对天后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反映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用主义大杂烩的性质。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改造,妈祖崇拜确实有了“天津特色”,已经成为天津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克(天津市平津战役纪念馆研究员、副馆长)《妈祖崇拜与天津文化》,选自《妈祖文化论文集》(第一册),第67~68页。

清朝中后期随着天津城内外各种集市、店铺纷纷建立,经营各种商品的市场一片繁荣。同时周边地区大小市镇经济能力逐步提高,日常商贸场所不断发展,城乡居民对“皇会”期间商品交换功能的需求逐渐减小。加之天津城市经济中心也由天后宫月围转到了北门外,宫前的庙会明显从百货云集变为仅经营一些年节儿童玩好,因而对商民吸引力锐减。而就以商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注重商业利益的城市而言,“人皆以贾趋利”无可非议。清末由于妈祖信仰与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已经拉开距离,由于难以看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势必影响信众参与祭祀的热情。

另外新兴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竞争,也促使人们对“皇会”的经济功能产生新的认识。尽管依然不乏“欲借皇会之名,发达天津商业”的主张,但人们已经认识到“夫商业发达与否,视乎工业。工业兴,则商业与之俱兴;工业败,与之俱败。今津地工业始有萌芽,不及早图之,为抵制洋货之策,而欲以戏弄之法招集商旅,畅销货品,是又愚谬之甚者也。处此春日方长之际,农工商贾各有本业,不远千里而来至天津观会者,系游民欤?抑或有恒业者欤?如有恒业之民必不至,又安望游民能销货品乎!况街衢拥塞,车马如云,步行尚不能货品,又安得购乎?”受此影响,天后宫适应形势,也改归商业劝工会,“在庙内陈列货品,以便提供工业而广销路”。

——方广岭(天津市图书馆馆员)《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选自《中华妈祖文化学术论坛》(第四册),第201~206页。

天后,原本为闽、粤一带民间信仰的神灵,怎么会在津门落户?对于天津的老百姓来说,天后是个外来神,怎么会成为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居家保护神?

不妨让我们把眼光往前推,因为在很长的年代中,天津地区以盐业为主要的经济依托,逐渐发展起来。隋代大运河开通后,进一步奠定了天津作为北方交通枢纽的地位。隋唐以后,由于宋辽南北对峙,天津一带又成为举足轻重的军事要地。金朝灭辽后,将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并改燕京为中都,几十万居民及庞大的政府机构、驻军所需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大部分是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征集,由运河运至中都。大批的漕粮经过今南运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汇集到今天津地区,由此再转运至中都。卫河与海河交汇处的旧三岔河口西南一带,就是河运漕粮的起点和转输点。由于地势较高,成为理想的天然码头,并随着漕运和制盐业的不断发展而成为航运的重要枢纽。

金朝末年,北方的蒙古族骤然兴起,内地亦不断爆发人民战争,为保障中都以及漕盐储运的安全,金王朝先在现天津市郊武清县和杨柳青镇派出“巡检”,率兵戍守。金贞佑元年(1213年)后又在这里建立“直沽寨”。从此,三岔河口一带便由单纯的漕运枢纽开始发展成为漕运与军事相结合的畿南重镇,并为天津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直沽”两字也成为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名称。直至今日,“直沽”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为天津的代名词。

元朝时,漕运河海并重(元代漕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河漕,第二阶段为海漕),使海河干流的航运功能日益明显,无论河漕还是海漕,地处三岔河口的直沽都是当时漕粮的集中和转输要地。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促使天津这一海滨荒地“舟车攸会,聚落始繁”。对于直沽寨这样一个重要地区,朝廷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于是,元朝廷祐三年(1316年)加强了对直沽寨的军事守备,并改直沽寨为“海津镇”。

由于元代的漕运,它所使用的舟师水手多为闽浙一带的南方人,他们世代在水上和风浪打交道,常年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作业,养成了

“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俗，而这些人心目中的保护神就是从宋时就得到敕封的林默。他们在往来于直沽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家乡的信仰风俗带入了这里。

而这时元朝皇帝为迎合漕运船工们，并使刚刚恢复的河漕顺利进行，便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对妈祖进行了第一次敕封，封号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河漕的起点，天津第一座天妃宫就在位于三岔河口那时尚无城的海河西岸建立起来。当时叫“天妃灵慈宫”（民间俗称“娘娘宫”）。因其地处海河西岸，故民间也称其为“西庙”，是目前保留年代最久远、最为完好的并且是受到皇封的。这里，有诗为证。做诗的人叫张翥，是当时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曾于至元年间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特使来此祭祀天妃。他在拜祭过程中，有感而发，即兴写下了这首诗：

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官袍。

以后，天津又陆续在河东大直沽、唐家口、东沽、贺家口、后尖山、前辛庄、咸水沽、葛沽、泥沽、马应、芦北口、陈家沟子、丁字沽、秦家庄以及蓟县、静海等地建有“天妃庙”。历史记载有16处，但后经文史专家董季群统计达27处之多。尤其河东大直沽，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因其在河东，故称“东庙”，大约始建于元延祐年间，1316年左右。这是为适应海漕而兴建的天妃宫，后因火灾逐渐衰败。2000年经考古发掘，在此建立了以妈祖文化遗址为主题的博物馆——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尚洁（天津天后宫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妈祖文化与天津600年》，选自《中华妈祖文化论坛》（第二册），第105～106页。

天津民间艺术丰富多彩，门类众多，享誉国内外，原因众多，但有一

条,以娘娘宫为中心形成的区域民俗文化区较长期的存在,使民间艺术的发展找到了一块沃土。

下面我着重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

天后宫(娘娘宫)出现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元朝把天津改为海津镇后,漕运更加发达,南来北往的船工们聚集于三岔河口附近,形成了天津特有的码头文化。

.....

据我考证天津的妈祖文化对津门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的影响深刻程度来说远胜其他地方。

天津九河下梢外接海口,内河航运与海运皆很发达,到了清代南方之贡品靠海运与运河集中天津后呈献京华,于是形成了庞大的船工队伍,南来北往,五方杂处,形成天津独特的码头文化。

码头文化的核心地区便是今日的宫南、宫北大街以及向西延伸的锅店街、估衣街、北大关等地带。

明清时期因为“漕运”繁忙,加之天后宫香火兴旺,宫南、宫北大街逐渐繁华起来,许多著名商家在那一带聚集。如天津八大家的“长源杨家”、“天成号韩家”、日升斋鞋铺、联升斋帽店、东六居酱园及一些当铺、银号、盐商等,组成了天津的经济中心。

每逢初一、十五天后宫有庙会,万民朝拜热闹非凡,自然带动商业兴旺。

在鼎盛旺期每年三月二十三天后诞辰期间,还要出“皇会”,几十道花会恭送娘娘回福建会馆省亲,倾城出动,观看“皇会”,形成天津一万人同乐的风景线。

到了旧年腊月,宫南、宫北大街自发形成了年货市场,浓郁的年文化在那里扑面而来。

直到20世纪初,军阀混战,市面不稳,许多商家为免遭掠夺,多迁往租界地,宫南、宫北大街才变得萧条了起来。然而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民间艺术却在那一带扎住了根,历经百年而不衰,我们说娘娘宫的泉水

孕育了天津的民间艺术之花，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天后宫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有庙会，庙会是小商小贩、民间艺术汇集的场所，清朝末叶以娘娘宫为核心的宫南、宫北大街逐渐演变为年货市场，一进腊月年关，许多经营年货的商贩自发在那里聚集，年年如此，岁岁不变。年货中不少是由民间工艺品组成的，如剪纸、窗花、吊钱儿、年画、风筝、泥塑、面人、糖人、糖画、风葫芦、脸谱……这些民间艺人为了生存与发展，技艺不断改进与提高，互相切磋技艺，取长补短，使工艺品更加精美。

有些民间艺人干脆在这一带摆摊设点长期经营，宫南一带形成了以年画为主的店铺，宫北却以风葫芦、竹编制品、绒花、烛码为核心，笔者童年时看过木版制的门神、财神、灶王爷灶王奶奶、老鼠娶亲等与年俗有关的手印画，这些制品皆出于民间艺人之手，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为民间艺术的发展与保存起着巨大的作用。

娘娘宫内除了供奉神像外，也有不少摊贩长期在庙两侧摆摊开铺，不少人也在经营手工艺品。娘娘神座下有很多小泥人是让要子女的人拎的，小泥人拎走，年年要洗娃娃，一年一年在变化，在“长大成人”这无形中推动了天津彩塑、泥塑的发展……

所以我们说天后宫养育了天津民间艺术之花，这话并非过分，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天津的天后宫除了发挥了妈祖的光辉外还照亮了天津的民间艺术发展之路，这是应该让人们承认与了解的。

——冯育楠(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后宫与天津民间艺术》，选自《妈祖文化论文集》(第一册)，第80~81页。

妈祖文化旅游节的成功举办，给了我们深刻的创意启示，即一定要想方设法，深入发掘、延伸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并扩大其外延，以天津天后宫为中心，做到一年之中，月月有节可过，天天人流涌动，把妈祖文

化做大做强,做成具浓郁天津特色的著名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

(1)重振皇会。历史上,能够参加皇会表演的民间文艺节目,都是最能代表天津地域特色的。据徐肇琮的《天津皇会考》,早年天津的妈祖诞辰,出皇会时先后共有 26 道会;又据望云居士等的《天津皇会考纪》,到上个世纪 30 年代,只剩下法鼓等 9 道会了,加上净街会也不过 10 道。据尚洁近著《天津皇会》所附插图,不见于记载者,尚有:巡风会、洛阳桥会、多福如意会、舞绣球会等等。问题是,今天如果再出“皇会”,我们还能出多少道呢?对于这样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实在有广泛发动群众,实施挖掘抢救的必要。只要能把失传的一道道会发掘整理出来,不但可以丰富天津地方文化,而且会成为人们争睹的保留节目。如果能把已知的所有皇会节目都能重新整理,去粗取精,每天表演一组,在宫前广场或天后宫内循环演出,一定具有相当的看点和吸引力:

(2)水面舞台。“亲水文化”是天津的地方文化传统之一,如果能够天后宫前的海河水面上,建造一个流动的组合水上舞台,下层为演员的化妆室和休息间,通过自动升降设备,把演员送到舞台上,表演皇会节目或其他文艺表演,肯定是别开生面的创举,一定会独具魅力。据悉,在 9 月 20 日第三届妈祖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上,将举行海河水面表演;晚间还要举行海河焰火晚会。我们热切期望这种水面表演的精彩和成功,并为以后搭造水面舞台积累宝贵的经验。

(3)新正钟鼓。这是近年来天后宫在新正期间组织的具有创意的活动,很受欢迎,目前还只限于子夜的撞钟。根据以往的经验,建议同时启动天后宫内鼓楼的击鼓活动,做到除夕与新正交替之时,钟鼓齐鸣。同时对于参加撞钟或击鼓活动者,赠以有价值或有新春意义的纪念品,祝福参与者在新的年里万事顺意、阖家平安。

(4)上元灯会。上元节始自汉代,虽说是具有佛教色彩,但在民间早已没有了宗教成分。在继承这一新春民间盛典方面,天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乐园灯会、人民公园灯会都已做大做强,成为了一项娱乐品牌。建议天后宫在每年的中元节组织自己的特色活动,如展

示早已失传的冰灯、麦苗灯等等,亦可创新研制果蔬灯之类,同时自制各种传统的或时尚的精美提灯,供游人选购。

(5)蟠桃庆典。相传,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是“女仙之宗”王母娘娘的生日,天宫照例要举行蟠桃盛会。所谓“蟠桃”,传为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的“仙桃”,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建议在天后宫内辟一全市唯一的“西山王母殿”,供奉西山王母金身以蟠桃作为全殿的主题点缀。每逢三月三,供应刚刚上市的油桃以及面制寿桃、点心寿桃和西点寿桃;长年供应或加工定制各色蟠桃工艺品和装饰品。

(6)端午龙舟。至迟在清代,天津已有端午赛龙舟的习俗,《津门杂记》和《津门竹枝词》中均有所载,可惜语焉不详。描述详细、且图文并茂的,大概莫过于清人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了。18 倡年端午节的前一日,麟庆道出津门,过三岔河口望海楼下,“见龙舟旗帜翱翔,游舫笙歌来往,虽稍逊吴楚之风华,而亦镌存竞渡遗意。……比过岔口,入上水,长年清泊。姬人洪友兰乃过船,奉蒲酒以进,并抱琴请鼓‘天问’一阙,以寄遐思;又拨琵琶,请奏‘夕阳箫鼓’一曲,以抒清兴。”此情此景,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的。端午适值天津初夏,风和日丽,在天后宫亲水广场前举行三天龙舟竞渡;同时由天后宫监制各种类型(竹叶、竹筒等等)的品牌粽子,“老虎锁”(即一串用丝绒缝制的小扫帚、簸箕、葫芦以及老虎、长虫、蝎子、蜈蚣、蛤蟆等“五毒”,如不及时组织抢救,恐已无人会做)等等现场供应,这些都不失为利用传统节令,弘扬民俗文化的好办法。

(7)七夕织女。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古代四大传说之首(其他三大传说分别为孟姜女、梁山伯和白蛇传),由于它代表了青年男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憧憬,在全国已经流传了近两千年。青年女子要在这一天向织女乞求智巧,这就是“乞巧”;同时,由乞巧引申出乞聪明、乞富贵、乞美貌、乞长寿,甚至乞良缘。过去,各地大都建有织女庙,其中以江苏太仓的织女庙最为有名。在台湾的北投,则把织女庙改为情人庙,供奉牛郎织女,庙联为“真情无人见,假情天有知”。庙内还有一块鸡心

石，上刻：“情人双双到庙来，不求儿女不求财。神前下跪盟天誓，谁先变心谁先埋。”从中受到启发，我们能否在天后宫后面的偏殿设一织女殿，安放牛郎织女及鹊桥，附有司马相如、卓文君像；殿旁搭建葡萄架，种植葡萄，以备七夕之夜来此静听牛郎织女哭声。或者再辟一室，建月老殿，供奉月下老人。这种“寓教于乐”、弘扬七夕文化做法，一定会受到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的特别青睐。

(8)中秋祭月。提起中秋，很容易让人想起嫦娥奔月的故事。传说嫦娥为后羿妻，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长生不老之药，被嫦娥偷吃，遂成为仙人，升天到月亮上。这则故事起源于两千年前的汉代。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月中何有？玉兔捣药”的传闻，以致玉兔成了月亮的代名词。关于过中秋节的习俗则起源较晚，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以后。传说在开元年间，唐玄宗于八月十五在宫中赏月，有术士罗公远在身边，问明皇说：“陛下莫非想到月宫中看一看吗？”明皇称是，于是罗公远把手中的柱杖抛向空中，化为一座银色桥梁，引导他上天，至月宫，只见数百仙女穿白色纱衣，在广庭大院中翩翩起舞；明皇上前问是什么舞曲？回答说叫《霓裳羽衣》。明皇暗记其谱，翌日召集臣工谱出《霓裳羽衣曲》，流传至今。在月亮的传说中还有吴刚伐桂的故事，说的是月中有桂树，高500丈，树下有一人，用斧子砍树身，但树身随砍随合，此人即吴刚。吴刚当初学仙，出了过错，于是罚他伐桂。中秋的传说这么多，哪个故事都可以利用，并且把他们变为形象的东西，供人观览。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每届中秋之夜，天后宫庭院中可设供桌若干，上设月光福（木板、洒金纸印制，画面为一满月，中有月光遍照的菩萨端坐在莲花之上，下为月宫、桂树，前有玉兔，站立执杵，捣臼中仙药。幅面大的有一丈，小的仅三寸余）及各种果品，专供女士拜月之用；另外还可监制各种型号、各种造型的月光祸、兔爷等，作为传统手工艺品发售。

(9)艳阳登高。这是中国传统的登高之日。古人以九为阳数，所以九月初九日也叫重阳节。重阳登高的习俗约起源于公元1~3世纪的东汉时期，相传桓景随费长房学道，一日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家

中有灾，全家人应以红纱为囊，内盛茱萸，系于臂上；然后登山、饮菊花酒。桓景依言去做，及至晚上回家，见家中禽兽全都死去，从此留下了头插茱萸、赏菊和登高的习俗。唐王维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上面那则故事可能起源较晚，因为据三国时期曹丕给友人的一封信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以为宜于长久。”可见古人过重阳节主要还是为了天长地久、健康长寿。所以今天我们把九月九日定为老年节。当年的九月九，东门外玉皇阁为登高的最好去处，士女咸集。老城里的水月庵和各座道观，均于晚间祭祀北斗，以水月庵为最，聚整股的高香为塔形，高两三丈，深夜焚之，可历昼夜，氤氲馥郁，芳腾数里，谓之攒斗；绅商子弟，在一旁着道装诵经。后来，水月庵废，则集中于玉皇阁攒斗诵经。此外，是在这天蒸粉作糕，上插小彩旗，名重阳糕，亦称花糕；天津民间多以层层酵面夹以红枣蒸制，俗称枣糕。有条件的，还要饮菊花酒。所谓：“玉皇阁耸好登高，小食家家枣作糕。早饭偕来万庆馆，快呼菊酒醉醞醞。”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比如，在天后宫内的楼阁之上摆设菊花酒宴，供应茱萸袋，粗细花糕；晚间在天后宫广场举行“攒斗”仪式等等。

(10)岁除商货。此腊月初八开始，天后宫可以准备各种独具特色的年货，如能够代表妈祖文化的吊钱儿、年画，包装精美的妈祖泉白酒、葡萄酒、饮料，各种特色糕点，系列速冻食品，如素饺、素合子；设计整桌的罐头“妈祖宴”，各种传统的儿童玩具……想方设法适应、满足现代社会快节奏的节日生活之需。

最近，有关部门已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就为我们在此基础上光大妈祖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罗澍伟(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传承民族艺术光大妈祖文化》，选自《中华妈祖文化学术论坛》(第三册)，第14~17页。